

嚴復在翻譯貢獻之研究

邱華君*

摘要

「譯事三難，信、達、雅。」這三大判別翻譯作品好壞的條件，「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對後世的翻譯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信、達、雅」之說乃出自嚴復《天演論》的「譯例言」以一人之力譯出一代思潮。。自嚴復以降，「信達雅」儼然已成為多人心中之翻譯「標準」，為翻譯定下了重要的原則。信是忠於原意，不失本真；達是具體達意，傳意力強；雅是文詞雅馴，文辭流暢。「信、達、雅」的三字，是翻譯界的金科玉律，盡人皆知」。他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名學淺說》等，系統地介紹西方民主倫理和科學，宣傳維新變法思想，將西方的社會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哲學和自然科學介紹到我國，為促進中國現代化思潮有密不可分的影響。

關鍵詞：翻譯、天演論、信達雅、進化論

*邱華君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法學碩士，中國文化大學法學博士，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副理事長，考試院顧問，淡江、世新大學兼任教授。電子郵件：james410925@gmail.com

壹、前言

嚴復（1854-1921）是邁向現代化中國以有系統方式引介西方自由主義的第一位思想家，影響深遠巨大。中年後，嚴復亦曾涉及政治、教育事務，親身參與現代中華民族富強的公共事務。老年時，目睹辛亥革命及其後中國動盪不安的政局、尤其外族列強挑起戰爭極為慘烈殘暴的事實，他寫下許多憂憤深廣的思想文字，體會到，只有「自強」，才能「保種」。而中華民族富強、自由之路，亟待尋找到圖強治國關鍵性的方策，嚴復除對中華民族傳統思想給予正面的肯定外，期待中華民族聖賢之道的再發揚，並擷取西方新知論著一系列翻譯成中文，乃為20世紀初期最重要啟蒙譯著，供國人研究閱讀，掀起思想突破換新，翻轉中華民族面臨強權欺凌時代命運。黃克武指出，嚴復譯文不只有直譯自英文的準確達意，更兼具古典詩詞的典雅。事實上，傳世至今的「信達雅」便是嚴復在其譯作《天演論》譯例言（譯者前言）所提出（黃克武，2022，頁62），更為我國帶動現代化思想先驅。

貳、中國現代化理論框架

現代化（Modernization），又譯近代化，該詞常被用來描述現代發生的社會和文化變遷的現象。根據馬格納雷拉（Paul J. Magnarella）的定義，一般而言，近代化包括了學術知識上的科學化、法律政治上的民主化、經濟上的標準工業化、思想作品多元自由化、生活文化領域的個人化、宗教色彩褪去的世俗化等。現代化是發展中的社會為了獲得發達的工業社會所具有的一些特點，而經歷的文化與社會變遷的全球性過程（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現代化理論（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2003: 頁96-107）不是一個單一理論，而是關於現代化的一個理論集合。雖然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歷史學對現代化的理論解釋有所不同，中國現代化理論框架從「傳統」到「現代」的發展路徑是決定於中國現代化的三個主軸，也是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三個主軸，即（一）從農業社會經濟到工業社會經濟；（二）從帝制君主到共和民主；（三）從經學到科學。在過去170多年的歷史過程中，這三個主軸或同時間發生，或先後時間發生，有時快時慢；有成

功，有不成功。因此，中國的現代化或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是不完全均衡的演進，但我們整體地看、歷史地看三個主軸在持續地在運作的，中國的現代化是有績效的，此乃我所說「今天已經出現了一個中華現代文明的基本形態」。20世紀50年代逐漸興起並席捲於西方社會科學領域的現代化理論的傑出貢獻，就在於其構建了一個「傳統—現代」的分析模型，在理論上較為科學地解釋了人類社會經歷工業革命前後的深刻演化與變革，在實踐上尚為發達國家實行現代化提供了某種理論指導方針。作為這個理論的核心內容就是如何區分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即劃分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標準問題。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現代化理論的學者們時點切入不同眾說紛紜，學派各有論述莫衷一是。對於許多早期現代化理論的學者來說，現代化常常等同於工業化（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13，頁575—585）。

列維 (Marion Joseph Levy Jr. 1918—2002) 就說，一個社會「現代化的程度是指這個社會的成員使用非生命能源和（或者）使用工具使他們的努力能產生更大的效果」（列維，1976，頁13）。並用這兩項衡量工業化的技術指標來區分「相對現代的社會」和「相對傳統的社會」。莫爾 (Wilbert E. Moore, 1873—1958) 則坦率地認為，現代化在絕大多數方面可以等同於工業化，然後再以工業化的前提、伴隨狀態、組成部分和後果來討論現代化。（Moore, 1963, pp.89-112）顯然，這種以少數幾個關鍵因素或指標作為區分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標準，具有十分明晰的確定性，但是把現代化僅僅等同於這樣一兩個指標，反而又使得現代化同義於「工業化」等概念而成為累贅。

隨著「傳統—現代」的分析模型應用於各個研究領域，學者們從各自的領域內提出了各種各樣、紛繁複雜的劃分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標準。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 (Simon Smith Kuznets, 1901-1985) 總結了現代經濟增長的六個特徵：1. 人均產值增長率和人口增長率很高；2. 生產力提高的速度快，即產出高於對每個單位的所有投入的比例；3. 經濟結構轉變的速度快，其包括從農業到非農業、工業到服務業的產業結構的變化，從個體企業到非個體經營組織的生產單位規模的變化，4. 以及消費結構、國內供應和國外供應所占比例等等方面的變化；5. 包括諸如城市化、世俗化在內的社會結構及其意識形態的變化迅

速；利用技術力量的增強；6.經濟增長的傳播。（Simon Smith Kuznets，1973，69 卷）]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認為，「權威的合理化、結構的離異化及大眾參政化就構成了現代政體和傳統政體的分水嶺」。社會學家斯梅爾塞（Smelser，Neil Joseph，1930-）以社會結構分化的程度和功能的成熟性來區別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指出現代化表現為五個方面的根本變化：A.政治領域中，簡單的村社權威系統讓位於以普選制度、黨派制度和科層制度為基礎的民主制度；B 教育領域中，則是文盲的減少和經濟生產技能的增強；C 宗教領域中，世俗化的信仰體系代替了傳統的宗教；D 家庭領域裡，擴展型的親緣單位轉向了核心型的親緣單位；E 社會階層的分化上，地理和社會的流動失去固定的、裙帶關係的等級約束。（Huntington，1989，頁 32）

心理學家英克爾斯（Alex Inkeles，1920— 2010），則認為，一個社會要完成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首先要實現從傳統人到為現代人的轉變。並且詳細地描述了現代人的九個特徵：（1）有接受經驗的能力，對革新與變化沒有先入之見；（2）在意向上不僅對其直接環境中產生的大量問題而且對外部產生的大量問題形成並持有自己的觀點；（3）面向目前和未來，而不是迷戀過去；（4）把計畫和組織信念視為處理生活的方式；（5）為促進個人目的和目標的實現而掌握環境，而不是完全為環境的需要所操縱；（6）相信世界是可以依賴的，相信可以依靠別人和別的機構來履行或完成義務和職責；（7）懂得別人的尊嚴，願意尊重他們；（8）相信科學與技術；（9）相信分配公正，相信根據社會貢獻而不是根據某人與這種貢獻無關的奇思妙想或特殊性質以獲得報酬。（Inkeles, 1966, pp. 138-152）

毫無疑問，上述羅列的各種標準清楚地反映了越來越多的現代化理論家的一個基本的共識，即現代化〔註 1〕不僅僅是工業化，其「包含著人類組織社會所使用的一切系統—包括政治系統、社會系統、經濟系統、知識系統、宗教系統和心理系統—的轉變」。他們所提出的各種標準也無非是想更為細緻與深刻地描繪出現代化這一歷史巨變的全貌，構建一個更為完善和準確的分析框架。然而與他們的願望相反，這種複雜的系統化標準卻讓人們在區分傳統社會

與現代社會的問題上更為困難。於此傳統與現代觀念釐清，惟賴外國經典論著新知譯成中文，打通國內有志之士的新思維，嚴復有鑑翻譯名著書籍刻不容緩，旋即著手選譯典籍，開創翻譯外文書籍劃時代的新頁。嚴復像，見圖 1。

圖 1
嚴復像



叁、嚴復為中國現代化西學翻譯之貢獻

一、建構翻譯原則標準

信、達、雅，由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顏復提出的翻譯理論，又稱「三難原則」。出自嚴復譯著《天演論》中的「譯例言」（王栻，1986，頁1321）。自嚴復以降，「信達雅」儼然已成為多人心中之翻譯「標準」，其講到：「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

「信」（faithfulness）指意義不悖原文，即是譯文要準確，不偏離，不遺漏，也不要隨意增減意思；

「達」（expressiveness）指不拘泥於原文形式，譯文通順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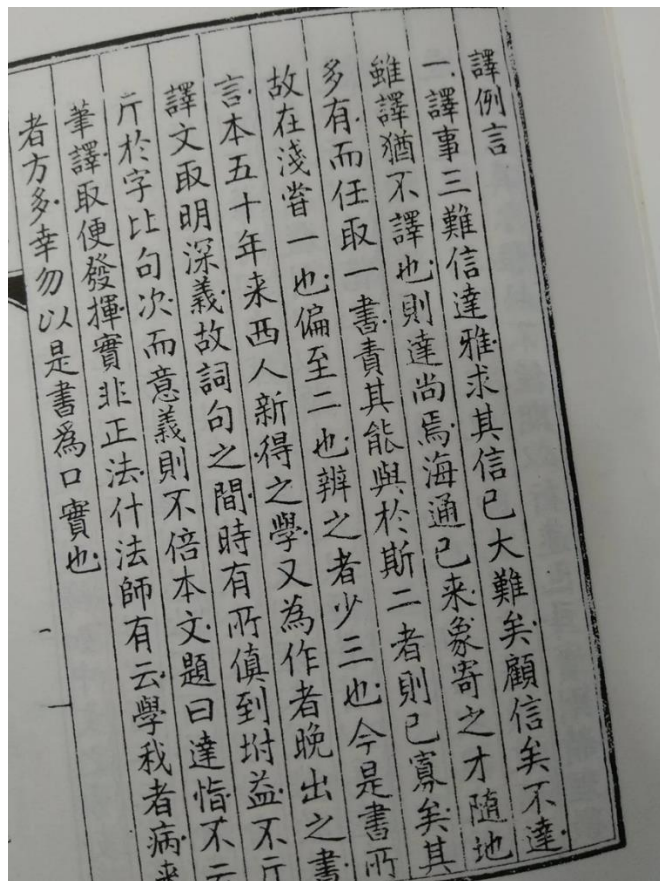
「雅」(elegance)則指譯文時選用的詞語要得體，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簡明優雅。

「信」指意義不悖原文，即是譯文要準確，不偏離，不遺漏，也不要隨意增減意思；「達」指不拘泥於原文形式，譯文通順明白；「雅」則指譯文時選用的詞語要得體，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簡明優雅。(湯瑪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譯者：1893 年，嚴復)

嚴復譯《天演論》，於〈譯例言〉首論「譯事三難：信、達、雅」，於是始開近代中國譯學契機。所譯八種，「中間義旨則承用原書，而所引喻設譬，則多用己意更易」，「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譯名力求典雅，「一名之立，旬月踟躕」；譯文則取法佛經翻譯，以古文為之，主於通達。或謂：嚴氏譯文分兩期，前期達而不信，後期信而不達。嚴譯著八種雖褒貶不一，泰西學術之引介，實有巨大貢獻無庸置疑。(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嚴復)信雅達，見圖 2。

圖 2

信雅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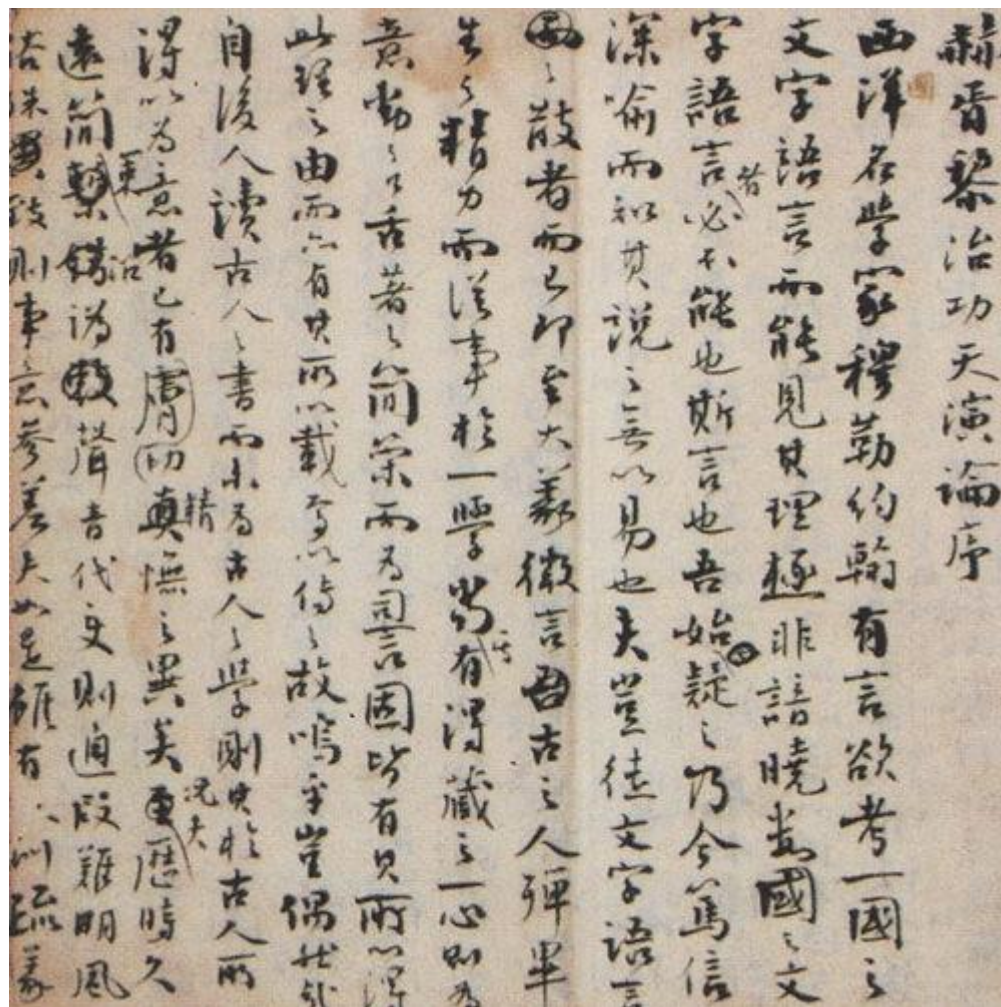
二、嚴復翻譯著作典籍

嚴復為有系統地將西學翻譯之先驅，如 社會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哲學和自然科學介紹到中國，翻譯了《天演論》、《穆勒名學（A System of Logic）》等著作。他的譯著在當時影響巨大，嚴復的翻譯考究、嚴謹，更為當時最重要啟蒙譯著。嚴復的翻譯考究、嚴謹，每個譯名都經深思熟慮，是以，他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對後世從事翻譯工作者產生標竿性的深遠影響〔註 2〕。

《天演論》，赫胥黎，光緒丙申（1896）譯序，湖北沔陽盧氏慎始基齋木刻出版，清光緒 24 年（1898 年），富文書局石印本，光緒 27 年（1901）（1897 年 12 月至 1898 年 2 月以《天演論懸疏》為題在《國聞彙編》刊載。原著書名為 Evolution and Ethics，1893 初版，1894 年再版譯。）見圖 3。

圖 3

天演論序



《原富》（《國富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10月（原著書名為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 年版）。

《穆勒名學》，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譯，南京金粟齋出版，光緒三十一年（1905）；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 年 12 再版（原著書名：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1843）。

《群己權界論》，約翰·穆勒，上海商務印書館，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原著書名：On Liberty，1859）。

《羣學肄言》（《社會學研究》），斯賓賽（Herbert Spencer，1820—1903），上海文明編譯書局，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改訂版，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原著書名：The Study of Sociology, 1874）。

《社會通詮》，甄克斯（Edward Jenks，1861—1939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原著書名：A history of politics，1900）。

《瀟意》（《論法的精神》），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上海商務印書館，清光緒三十年（1904）至清宣統元年（1909）De l'esprit des lois, 1748，譯依 Thomas Nugent 英譯本 The Spirit of Laws, 1750）。

《名學淺說》，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上海商務印書館，清宣統元年（1909）（原著書名：Primer of logic, 1876）

嚴復總共譯有 8 部西方作品，合稱「嚴譯名著八種」。嚴復對自己的譯著頗有自信，曾在信中說：「且彼中有數部要書，非僕為之，可決 30 年中無人可為者。」（楊正典，1997，頁 25）

肆、嚴父翻譯著作內容概述

一、《天演論》

《天演論》原名《演化論與倫理學》，是嚴復翻譯自英國生物學家湯瑪斯·亨利·赫胥黎名為 *Evolution and Ethics* 的演講與論文集，此書闡發了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一書中關於生物進化的理論（theory of evolution），進化論，是以史為鑑，要找出生命生存規律和發展方向的系統性的科學理論。

嚴復並未將原著完全翻譯，且除了翻譯之外還加入許多自己的見解，或是加入其他學者如斯賓賽（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主張。赫胥黎原著後半部認為倫理學不能等同於生物演化論，演化論是演化論，倫理學是倫理學，

但是嚴復反對這樣的觀點，他提出斯賓塞的學說，認為自然界的進化規律完全適用於人類社會。

《天演論》的基本觀點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萬古不變，而是不斷進化的；進化的原因在於「物競天擇」，「物競」就是生存競爭，「天擇」就是自然選擇；這一原理同樣適用於人類，不過人類文明愈發展，適於生存的人們就愈是那些倫理上最優秀的人。進化論學說的基礎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中奠定的，赫胥黎堅持並發揮了這一思想。見圖4。

嚴復譯述《天演論》不是純粹直譯，而是有評論、有發揮。他將《天演論》導言分為18篇、論文分為17篇，分別冠以篇名，並對其中28篇加了按語。嚴復在按語中指出，植物、動物中都不乏生存競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例子，人類亦然。人類競爭其勝負不在人數之多寡，而在其種其力之強弱。

嚴復有目的、有針對性的在書中發出了他憂國憂民的救亡政見。自《天演論》之後，國人紛紛開始用進化及競爭的目光，為近代處於危難之中的中華民族尋找出路。

圖4

天演論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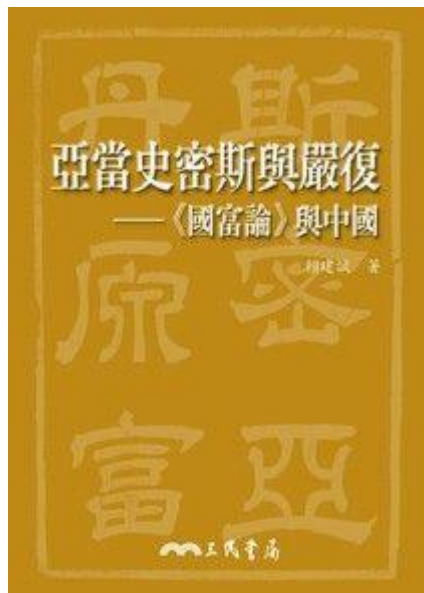
二、《國富論》

嚴復對《國富論》的理解、嚴復譯《原富》中的按語等作了精深研究，令人獲益匪淺，是《原富》研究中少見的大作。嚴復指出：「物競之水深火烈，時平則隱於通商庀工之中，世變則發於戰伐縱橫之際。」² 中國要想在生存競爭中避免被淘汰，必須向西方人文科學學習，尋求獲致富強的方法，學習運用西

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即為其一。他說：「計學者，切而言之，則關於中國之窮富，遠而論之，則繫乎黃種之盛衰。」《國富論》「有功生民，開悟來學」。從社會影響來看，嚴復將晚近歐洲富強之效「悉歸功於亞當·史密斯之一書」，⁴雖然過於誇張，但有合理成分，即《國富論》所倡導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為世界上許多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採納，推動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從學術角度而言，《國富論》「於理財法例及財富情狀開山立學」，⁵奠定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自由通商之說在西方已成常識，可以稱之為「舊雨」，但在中國仍為「新知」，並未過時。⁶嚴復選譯亞當·史密斯《國富論》的主要原因是：《國富論》為經濟學的開山之作，便於淺學啟蒙；其體例有利於嚴復取便發揮，托譯言志；亞當·史密斯對重農主義和重商主義的批駁，可以洋為中用，「指斥當軸之迷謬」；嚴復將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視為改變近代中國的靈丹妙藥。見圖5。

圖5

《亞當史密斯與嚴復---《國富論》與中國》封面



三、《穆勒名學》

此書主要在闡述理則學，通稱**邏輯**，源自古典希臘語 (logos)，最初的意思是「詞語」或「言語」(引申出意思「思維」或「推理」)；1902年嚴復譯著《穆勒名學》，將其意譯為「名學」，音譯為「邏輯」。它經常被稱為是對論證評價準則的研究，儘管邏輯的精確定義在哲學家之間是有爭議的事情。欲正名者，當知名義，並為界說。《穆勒名學》部甲篇八，即為「論界說」(Of definition)，甚且該書亦以「名學」之界說為其始事。嚴復深知正名與界說，乃密不可分。其發「多含混閃爍之詞」等語，即因時人昧於界說之故。不明界

說，故用名不察，此亦流俗之病也（王栻，1986，頁 95-96）。見圖 6。

圖 6

《穆勒名學》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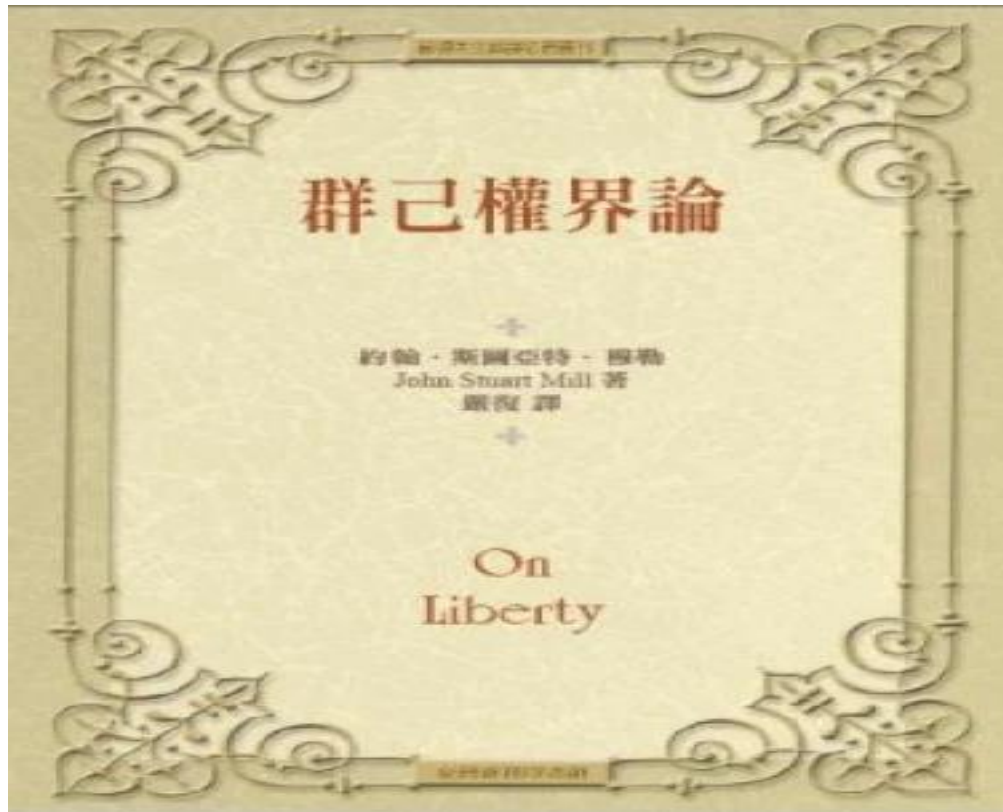
四、《群己權界論》

《論自由》（*On Liberty*，嚴復譯《群己權界論》），是英國哲學家約翰·史都華·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出版於 1859 年的一本功利自由主義哲學著作。密爾在書中將一個以功利主義為原則的倫理學體系推廣到社會和國家層面上，並考查了界定權威和自由之間關係的標準。自由在個人與群體間的分寸是非常精微的，嚴復當年用文言語句翻譯穆勒（密爾）的《論自由》時（*On Liberty*），將書名譯作《群己權界論》。嚴復以「自繇」二字，將穆勒（密爾）對個人尊嚴與自由的想法引介至中國，讓近代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於西方的自由思想，有了一個開創性的認識；並相當重視群與己之間的互動與平衡。

由一人一己之自繇，乃至一會一黨之群體，須明白群己權限之劃分，使不偏於國群而壓制小己，亦不袒護小己而使國群受害，並強調自由民主制度的實施其實是涉及一個國家的形勢與國民程度。對於自由的內涵、個人與群體、公域與私域間的權界，析論分明。見圖 7。

圖 7

《群己權界論》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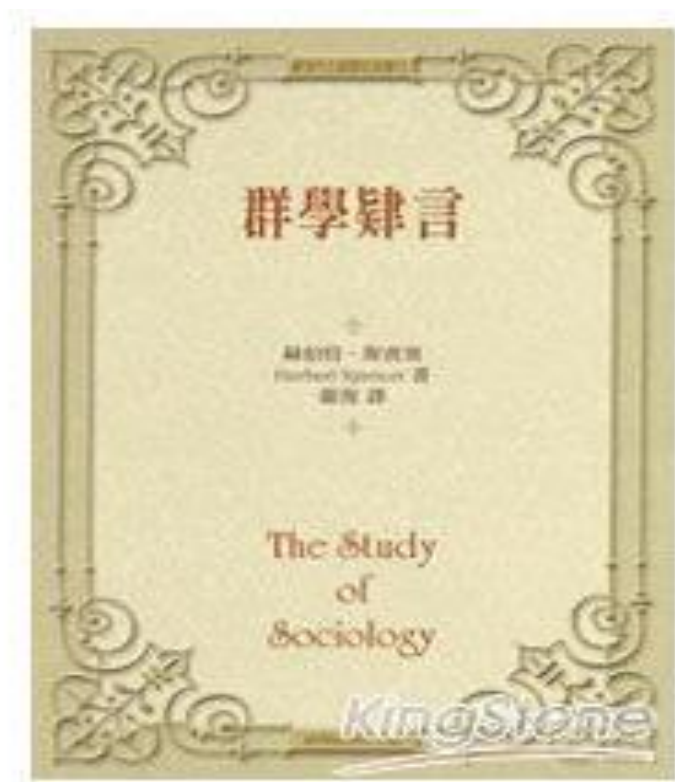


五、《羣學肄言》

《羣學肄言》是嚴復於 1897 年翻譯赫伯特·斯賓賽（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會學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的譯本。〈《羣學肄言》譯余贅語〉中提到了最早對《社會學研究》的翻譯，1897 年在旬刊《國聞彙編》中以《斯賓塞爾勸學篇》連載，對應《羣學肄言》的〈砭愚第一〉。嚴復在翻譯的同時夾雜自己的議論，「以天演為宗」，以生物學規律研究社會現象，論證中國的社會變法。嚴復翻譯出版《羣學肄言》是社會學導入中國的標誌性事件之一。見圖 8。

圖 8

《群學肄言》封面



六、《法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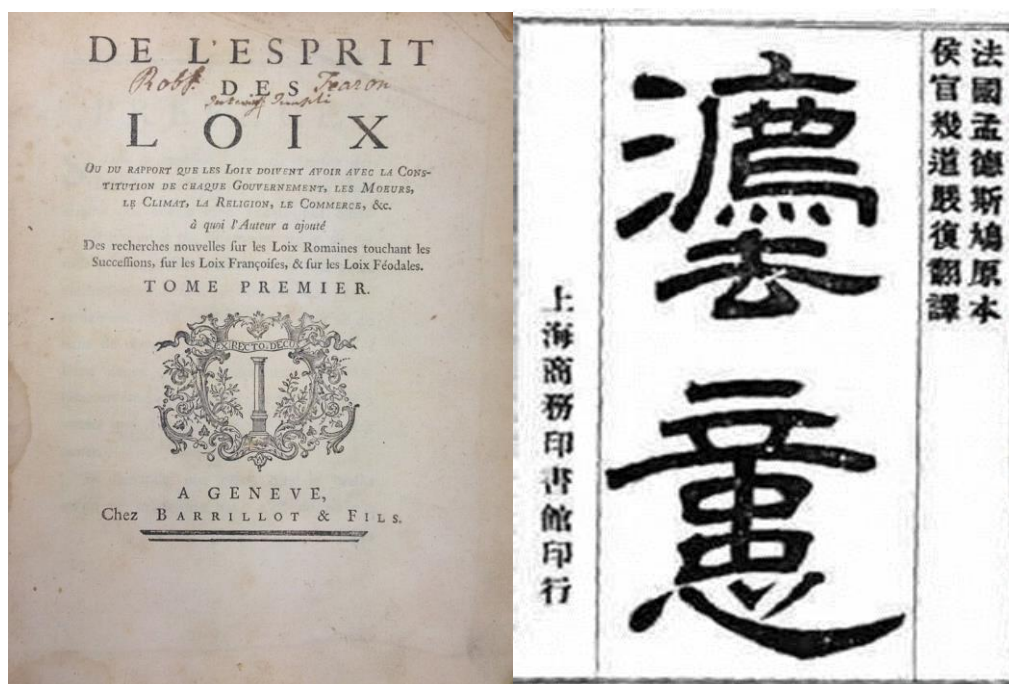
《論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是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的政治學名著，歷時 14 年完成。該作品最早的中文版本譯作《萬法精理》（法學，第 242-253 期 2020-07-24）1909 年，嚴復將此書譯為中文，題名為《法意》，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嚴復致力翻譯時，加入 300 多條按語。卷首還介紹孟德斯鳩的生平事蹟。嚴復更表示「拿破崙於兵間攜書八種自隨，而《法意》為之一。後其國更張法典，勒成專編，近世法家，仰為絕作嚴復譯，第一章法律通論，第一節：一切法與物的關係。這一節主要大意是：

- 1、法是各種存在物的反映，而不是憑空產生。
- 2、先有事物，後有法律，「必先為之律令名義，而後可以喻人」。（與梁啟超書）見圖 9。

嚴復的按語：儒所謂理。佛所謂法。法理初非二物。也說社會上的道理、禮儀、法令，與事物有一定的聯繫。形氣自然之法中。一、第三個按語原文：復案。孟氏所標之自然公例四。一曰求安。二曰自養。三曰相助。四曰愈愚。其求安由於恐怖。其自養由於空乏。相助者形氣之合。第三節：人為之法典中。一、按語原文復案。西人所謂法制。殆盡於是三。國際公法。其源蓋古。〔註 3〕

圖 9

《The Spirit of Law》封面



七、《社會通詮》

嚴復於 1903 年譯著的《社會通詮》一書，就是英國學者甄克思於 1900 年出版的《政治史》(A History of Politics)，首次把“totem”一詞譯成「圖騰」，從此成為中國學術界的通用譯名。此書實際上講的是政治進化史。甄克思和嚴復都認為，在宗法社會和國家社會（即軍國社會）之間存在著一個“拂特之制”（feudalism，今譯封建制度）的時期。嚴復在按語中指出，圖騰是群體的標誌，旨在區分群體。並認為中國古代也有與澳洲原住民和印第安人相似的圖騰現象。運用圖騰解釋神話、古典記載及民俗民風，往往可獲得舉一反三之功。什麼叫圖騰？圖騰就是原始人迷信某種動物或自然物，同氏族有血緣關係，因而用來做本氏族的徽號或標誌。見圖 10。

圖 10
社會通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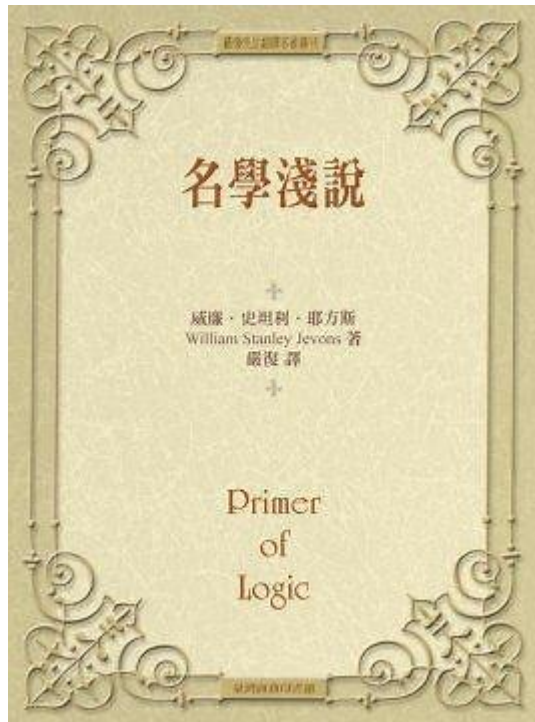
八、《名學淺說》

英國耶方斯(W.S.Jevons, 1835—1882)著。嚴復於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譯，次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無按語，但在譯文中加入己見。凡二十七章，為邏輯學入門書。嚴復對此書推崇備至，認為邏輯方法是求知的最科學方法。嚴復將耶方斯的 Primer of Logic 譯介至中國。嚴復以「名學」二字譯稱西方邏輯 (Logic) 之學，開啟後來中國邏輯課程的授課之門。鑒於當時譯詞多與西文本義乖張，嚴復此書的譯述以半文言文，中間意旨，承用原書；引喻設譬，則多用己意，譬喻之例、書中譯詞皆富深厚的國學涵養，其對文句之講究、譯事之謹慎，不

僅為後學效勉，此書的譯述更推動了當時對西方邏輯思想的認識。見圖 11。

圖 11

名學淺說



伍、嚴復譯著對現代中國思想與學術的影響

嚴復從 1895 至 1911 年十餘年間，向國人介紹了大量國外新知，對中國近代新文化建設做出多方面的重要貢獻，成為倡導近代新文化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國近代學術的拓荒者。嚴復對中國近代新文化的貢獻可以概括為這樣三個方面：一是以新的思想武器批判封建舊文化，開展思想啟蒙；二是正確闡明科學與民主的時代意義，構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內容；三是譯介西方學術，推進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嚴復逐譯心力付出，如譯著《天演論》等書對於現代中國思想與學術史有劃時代的影響。甲午之後，新文化運動之前，整整一代人主要透過嚴復的翻譯去認識西方的學術與思想，而其中影響最深也最廣的，莫過於《天演論》一書。甲午戰後，中國知識界對於傳統文化作為政治社會人生的最高指導的信心開始崩解，對西方文化也才開始有了熱切的興趣與信心。原有的學術與思想體系開始受到根本而全面性的質疑，建立新體系的要求隨之而起。中國現代學術與思想史，應以此新舊體系轉移之際作為斷代的起點；而嚴復所引進闡釋的天演論，則成功地塑造了這個關鍵時期的世界觀，並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現代的學術與思想走向。

此後的變法與革命思潮、激進主義、軍國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斯主義、自由主義、生機主義、實用主義、科學主義、反形式理則思想、反啟蒙思

想、現代保守主義與其他多種主要時代思潮，都在天演論譯意的世界觀與學術觀之基礎上繼續發展。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至今，中國人對世界的基本原理之諸多看法，例如自然主義、唯物論、進步觀、變化動進主義、世變趨繁論、本體不可知論、人與生物同原同類論、社會演化論、社會有機體論、自由競爭主義、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等，都導源於嚴復譯著的天演論。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現代中國人文社會學界所普遍重視的發生學的方法、歷史學的方法、自然科學的方法、變動的真理觀、經驗主義、實驗主義、實證主義、乃至馬克斯主義方法論，也都深受天演的世界觀及嚴復《天演論》一書中所表現的學術態度之影響。此書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與學術史上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然而長期以來，學界對於嚴復《天演論》一書的作意，多偏從救亡保種、追求富強、促進變法、「危機哲學」等觀點加以詮釋。這些說法，雖有其一定的道理，然而嚴譯《天演論》更根本的作意，卻長期為學界所忽視，因此對於本書的主要內涵，及其所表現的學術性格與思維方式也有相當嚴重的誤解。本文企圖論證嚴譯《天演論》的真正作意在於會通西方與中國的最高學理以明道救世。不明於此，我們將無法瞭解本書深刻的內涵與其學術及思想的特質，亦難以解釋何以此書在中國現代思想與學術史上可以有如此深遠的影響〔註4〕。

《原富》首次較為完整地將《國富論》的思想展現在國人面前，對晚清知識界具有重要的啟蒙作用；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嚴復提出的一些具有針對性的建議，對革除積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本書最早明確提出財富形成的泉源和過程，揭示出財富在社會各階層的分配。書中所提到的分工原理、供需法則、生產三原素、資本論，都是形成今日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基石。而且對於勞動市場、商品市場、貨幣市場、生產要素市場、資本循環、專業分工等都有相當多的論述，其中亦有不少是為了抨擊當時的重商學派及重農學派的理論而生。尤其認為經濟的出發點是利己心。經濟學聖經。改變人類歷史，影響至今的不朽名著。劃時代思想巨擘。此前各種思潮皆注入其中，此後百般學派皆從其而出。史密斯在書中所強調的「分工」、「自利」、「不可見之手」、「自由市場」等等。

嚴復云：「然則何不徑稱計學，而名原富，曰從斯密氏之所自名也」，又說：「原富者，所以察究財利之性情，貧富之因果，著國財所由出云爾。故原富者，計學之書，而非講計學者之正法也」，知命名為「原富」，係嚴復之意，是「從斯密氏之所自名」，主要是「察究財利之性情，貧富之因果，著國財所由出」。（嚴復，譯事例言，頁168）

《羣學肄言》一書，幾二十萬言，千端萬緒，而極其究竟，亦曰羣治之難言耳已，亦曰言羣治者之必由學耳已夫。苟誠知羣學之難，學之必精，言之必

慎，其庶幾矣。

《羣學肄言》正文開始前的一段話，也是本章最大的疑問。為何一本討論西方社會學研究法的科普著作，看在嚴復眼裡卻如同中國傳統經典《大學》、

《中庸》那般重要？熟悉斯賓塞哲學體系的嚴復，於《群學肄言》，西學社會之界說曰：民聚而有所部勒東學稱組織祈向者，曰社會。而字書曰：邑，人聚會之稱也。從口，有區域也，從卩，有法度也。西學國之界說曰：有土地之區域，而其民任戰守者曰國。而字書曰：國，古文或，從一，地也，從口，以戈守之。觀此可知中西字義之冥合矣（王栻，1986，頁 126）。如此，求其本原、本真、本然，而歸結中西字義冥合。此「合」，就嚴復而言，方為東西詞之真合，且「一合而不易離」。此種結合不離之境，可能即為嚴復理想之翻譯原型。

《法意》孟德斯鳩一書譯為《論法的精神》，嚴復譯。嚴復在翻譯時，在書中加了大量按語，共計 167 個，這些按語很有意思，別有一番風格。嚴復按語都是古文，晦澀難懂，將《法意》中的第四個按語白話文化，略加賞析。按語原文復案，孟氏於人類所以為群之德，可謂見之真，而能言其所以然。

《群己權界論》《論自由》主張，如果要干預其他人自由，就只有一個合理理由，那就是自衛，而用權力違反文明人意志，只有一個正當理由，那就是防止傷害他人。¹密爾在開頭提到，這本著作的主題不是意志自由，而是社會能合法施加於個人的性質和限度。《論自由》的影響深遠廣泛，且一經問世即受到高度評價，被譽為「肯定人類個體的個性不可泯滅的價值最優雅，意義最重大，影響最為深遠的宣言」。「自然」、「自在」、「自繇」等。其翻譯之法，即以漢詞初義，譯西詞初義。例如「中文自繇，常含放誕、恣睢、無忌憚諸劣義，然此自是後起附屬之詁，與初義無涉。初義但云不為外物拘牽而已，無勝義亦無劣義也」（王栻，1986，頁 132）

嚴復於《穆勒名學》內，將「真理」（truth）譯為「誠」，如引論第三節「論名學乃求誠之學術」，原文為 “Or is logic the art and science of the pursuit of truth?”。「誠謂誠實」，其「誠」，可作「誠意正心」解，亦可作「真理」解，而「實」，則為「理實」之謂也。因此，即不難理解為何嚴復會言：「學問思辨皆所以求誠、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王栻，1986，頁 1028）。

《名學淺說》第六章所稱「文字正當用法」（correct use of words）（嚴復譯，1966，頁 19-25）。嚴復目睹當時新名諸多不當，遂有感而發：科學弗治，則不能盡物之性，用名雖誤，無由自知。「不能盡物之性」，係謂對於所名之物，不察其實，而妄加命名。例如「自來水」云者，其實乃「筩引泉流」，[爽

斗] 高播下。人機之力，所費實多。彼水又烏能自至」(嚴復譯，1966，頁25)？時人不察其理，而云「自來」，誠立名不當也。

嚴復認為甄克思在這《社會通詮》書中，用歷史發展階段的觀點，把歷史描繪成從圖騰社會向宗法社會、再向軍國社會發展的過程。他認為，在軍國社會裡，個人是組成社會的基本細胞，人民是平等的；而在宗法社會中，社會細胞由家族構成，個人歸各自的宗族統轄，並受到祖法的約束，沒有自由。受到甄克思這種進化史觀的影響，嚴復認為當時的中國終於進入軍國社會階段，屬於七分宗法、三分軍國性質的國家。

陸、結語

嚴復為近代著名的翻譯家、思想家、教育家提到翻譯家嚴復，就會想到他提出的翻譯標準「信、達、雅」，就會想到他翻譯《天演論》中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註5〕的生物進化規律也適用於人類社會，闡明中國若順應天演規律，變法維新，就可「自強保」，反之則會「亡國滅」，為天演進化所淘汰。嚴復希望讓民眾認識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激勵民眾鬥志毅力，強調變法革新的重要性。康有為詩曰，「譯才並世數嚴林，百部虞初救世心」，無論林紓還是嚴復，皆有大志，都不把自己視作「譯才」。嚴復對於西方科學有透徹的了解，「人生閱歷，實有許多不可純以科學通者，更不敢將幽冥之端，一概抹殺」。他說「中國以學為明善復初，而西人以學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中學與西學，或說舊學與新學，在他看來，並不對立。「新學愈進則舊學愈昌明；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必將闊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而後得之。」(王栻，1986，頁518-519)他書房掛置：「有王者興，必來取法；雖聖人起，不易吾言」嚴復系統地將西方的社會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哲學和自然科學介紹到中國，他陸續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己權界論》、《群學肄言》、《社會通詮》、《法意》、《穆勒名學》、《名學淺說》等八部名著。他的翻譯原則標準對後世的人專注於翻譯工作產生巨大傳承影響，是中華民族二十世紀最重要啟蒙外文典籍譯著泰斗。

總之，嚴復是個一位在中國近代史人佔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在國家面臨危機時，他主張引進科學、民主和西方文化；嚴復不贊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主張「自由為體，民主為」。他認為，體用是不可分割的提出了很多建設性意見；他第一次建立起一個中西哲學滙集整合、以近代民主科學自由為理論基礎的哲學體系，從中國思想發展史的角度看，他在近代中國給國人帶來了近代西方的新思想和新觀點，注入翻轉富國自強的新方向，強調中國富強之要，統於三端：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其足見嚴復不僅是令人敬重的一位教育家、翻譯家，還是一位哲學家和思想家，對我中國現代化極具深遠影響貢獻。

註釋

〔註1〕按現代化理論是指關於開發中國家發展研究的一種學說。主要探討開發中國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現代化的理論、模式、戰略方針乃至具體政策。源於19世紀盛行的關於社會經濟變遷與發展的一般理論，特別是涂爾幹（Émile Durkheim，1858-1917）和韋伯（Max Wilhelm Carl Weber，1864-1920）的思想，盛行於20世紀50—60年代。創立者主要是美國的一批社會科學家，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結構-功能主義學派為代表。主張：（1）現代化是一個向歐美型已開發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系統演變的過程；（2）開發中國家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主要受內部因素（道德規範和價值體系等）制約，其中價值觀的轉變是社會變革最基本的前提；（3）開發中國家通過接受西方已開發國家的先進技術、科學文化以及思想觀念，克服傳統的障礙，必將走上與已開發國家相同的道路；（4）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在輸入具有現代化特徵的先進技術、科學文化和思想觀念上，成功率存在差異。

〔註2〕嚴復「三難原則」是三國時期佛教譯經大師支謙所譯《法句經》序里的「雅、嚴、信、達」來的。有學者像伍蠡甫、鄒振環皆指出，蘇格蘭法學家亞歷山大·弗雷澤·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在1791年出版的《翻譯原理論》（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的「三條翻譯通律」（the Three General Laws of Translation）對嚴復從事翻譯的影響很大。

〔註3〕法律的精義，或立法的精神。

書名，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的政治思想著作，於西元1748年出版，由嚴復翻譯為《法意》（西元1909），現譯為《論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該書認為法律會因社會習俗、文明與自然因素的變化而有所調整。書中亦將政治體系分成專制、君主與共和三種，其支撐的原則分別為：對統治者之恐懼、熱愛榮譽與崇尚德性。此書後世的評價不一，有學者視之為法國與美國分權制衡政治的思想泉源，亦有學者認為該書仍主張精英統治。

〔註4〕俞政的《嚴復著譯研究》描述：「嚴復一生著、譯甚多。他在翻譯西方論著的時候，常常摻雜己意，還要附加大量按語；有些譯作甚至帶有不同程度的改編（如《天演論》、《名學淺說》）；因此，人們把他的翻譯作品稱為譯著。意思是說他的譯作中的不少內容相當於他的著作，反映的是他自己的思想。」

〔註5〕梁啟超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日《清議報》發表文章《自由書·豪傑之公腦》指出：「蓋生存競爭，天下萬物之公理也。既競爭則優者必勝，劣者必敗，此又有生以來不可避免之公例也。」許多書中的口號「物競天擇」、「優勝

劣敗」、「適者生存」、「天演進化」等皆成為報章雜誌之專有名詞，使中國學子朗朗上口，如胡適之名就是從「適者生存」而來。

參考文獻

- 王宏志（2007）。重釋「信達雅」——論嚴復的翻譯理論。載於重釋「信達雅」20世紀中國翻譯研究（頁87-120）。清華大學出版社。
- 王栻（1986）。嚴復集（共五冊）。中華書局。
- 王栻（1986）。天演論譯例言。載於嚴復集，頁1321。
- 王栻（1986）。法意。載於嚴復集，頁1285。
- 王栻（1986）。穆勒名學按語。載於嚴復集，頁1031。
- 王栻（1986）。群己權界論譯凡例。載於嚴復集，頁133。
- 王栻（1986）。群學肄言譯餘贅語。載於嚴復集，頁126。
- 亨廷頓（1989）。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
- 金耀基（2001）。中國現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構——論中國的「現代化」與「現代性」。頁21。]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75.html>]
- 阿爾朋（1966）。民族社會和國際社會中的現代化革命。諾莫斯。8期。頁179。
- 英克爾斯（1966）。人的現代化。載於現代化：增長的動力，頁138—152。
- 高惠群、烏傳袞（1992）。翻譯家嚴復傳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高聖兵（2008）。Logic 漢譯研究——跨文化翻譯中的「格義」、視域融合與接受。
- 庫茲涅茨（1973）。現代的經濟增長：發現和思考。美國經濟評論。63卷。頁7。
- 陳永國（主編）（2005）。翻譯與後現代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蒂普斯（1996）。現代化理論與社會比較研究的批判。上海譯文出版社。
- 列維（1976）。現代化和社會結構，〔未註出版社〕。
- 莫爾（1963）。社會變化。〔未註出版社〕。
- 黃克武（2008）。新名詞之戰：清末嚴復譯語典和製漢語的競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2，1-42。
- 黃克武（2009）。近代中國新概念的形與傳播：嚴復與梁啟超的比較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 黃克武（2010）。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聯經出版。
- 黃克武（1998）。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允晨文化。
- 楊正典（1997）。嚴復評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嚴復（譯）（1896）。天演論。商務印書館。
- 嚴復（譯）（1902）。名學淺說。耶方斯著。臺灣商務。
- 嚴復（譯）（1902）。穆勒名學。穆勒著。臺灣商務。

- 嚴復（譯）（1903）。羣學肄言。斯賓賽著。臺灣商務。
- 嚴復（譯）（1901）。原富論。亞當 史密斯著。臺灣商務。
- 嚴復（譯）（1904）。法意。約翰穆勒。臺灣商務。
- 嚴復（譯）（1903）。群己權界論，約翰穆勒。臺灣商務。
- 嚴復（譯）（1903）。社會通銓。甄克斯著。臺灣商務。
- Aristotle (1988). The rhetoric. In T. W. Benson & M. H. Prosser (Eds.), & R. C. Jebb (Trans.), Readings in classical rhetoric (pp. 53-62). Davis, CA: Hermagora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c.330BCE)
- Herrick, J. A. (2009).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rhetoric: An introduction (4th ed.). Pearson.
- Huxley, T. H. (1894).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Macmillan and Co.
- Magnarella, P. J. (1974).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 Turkish Town*. Cambridge :
- Rousseau, J.-J. (1986). Essay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s in which something is said about melody and musical imitation. In V. Gourevitch (Ed., Trans., and Annotated), The first and second discourses, together with the replies to critics, and essay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s (pp. 239-295). Harper and Row.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81).
- Smith, A. (1983).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In J. C. Bryce (Ed.),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IV.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pencer, H. (1898). Philosophy of style. D. Appleton and Company.

Study on Yen Fuh's Contribution of Translation

Haw-jiun Chiu*

Abstract

Studies on Yen Fuh's view of translation often focus on his xin, da, ya. This paper, however, intends to diverge from this line of discussion. The author sees Yen's translation, stat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hermeneutic) as interrelated speech acts and exami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Yen's statements on and practices in translation-rhetoric that are dispersed in various texts. Yen's translation, stat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also converge into a larger discourse.

Keywords: Yen-Fuh his-da-ya Translation Revolution

*James Haw-Jiun Chiu, Professor of Shih Hsin University.